

商务印书馆

主编 刘东

中國學術

总 第二十六辑

CHINA SCHOLARSHIP Vol.7 No.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术. 第26辑/刘东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ISBN 978-7-100-06764-5

I. 中… II. 刘… III. 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2941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封面题签 饶宗颐

ZHONGGUÓ XUÉSHÙ

中国学术

总第二十六辑

主编 刘东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764-5

2010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 × 960 1/16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3 插页 1

定价: 36.00 元

卷 首 语

上一期杂志印毕之时，正赶上清华国学院的成立大会，所以我们简直是喜气洋洋地，把它当作一件礼物送给了与会者。——这种双喜临门或许有些巧合，不过它正好可以作为一种象征，标明最令自己看重的两项事业，几乎是同时开始重新振兴起来了！

正因此，在这新一期的《中国学术》上，就发表了自己反复斟酌达半年之久的清华国学院院训——“宽正、沉潜、广大、高明”。而饶宗颐教授那幅具有金石意趣的题写，更使这八个大字充满了古意。毫无疑问，既然已是强强联手，那么我们在研究院里提倡的学风，自当成为在杂志上主张的文风。

正好就借机交代一下这组词汇的出处，——确切地讲，只是它们在我本人内心的出处：或许也还有更早的语义来源，然而当自己拈出这些语汇时，首先联想到的就只是下述经典。——所谓“宽正”，出自《孔子家语》中的“外宽而内正”；所谓“沉潜”与“高明”，出自《尚书·洪范》中的“沉潜刚克，高明柔克”；而所谓“广大”，则出自《礼记·中庸》中的“致广大而尽精微”。

事实上，除了经典中的出处，在呼吁上述学风的时候，主要还是想到了现实的语境本源。对于这一点，我不久前曾在一次访谈中，这样来通过其对立面来界定它们：

更为重要的是，你只要想到各自的反义词，就会想到它们在针砭和砥砺什么了。“宽正”是针对“偏激”而言，反对刻意求新而不惜偏激；“沉潜”是针对“浮躁”而言，反对急功近利和浅尝辄止；“广大”在反衬“偏科”，要求思接千载心忧万民，而非为了课题意识而舍弃问题意识；“高明”则在反衬“表浅”，要求既有高远的终极关怀，又有深刻的洞察力。

但愿我们今后的学术追求,无论在这所研究院中,还是在这本杂志中,都能念兹在兹地守住那几条底线。

或许,等到杂志再次印好的时候,已经快要逼近岁末了吧?想到这一点,难免就生出一种心愿,想要把这最新的成果,奉献给自己敬爱的业师——李泽厚教授!尽管由于严重的右脚扭伤,这次又阴差阳错地未能见到他,但我内心中却从未停止过默念:明年就是李老师的八十大寿了!要是实在找不到别的形式,那就姑且先以这种形式,向对自己毕生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表示由衷的敬意吧!

无论如何,在我们还未曾学会思考的年代,李泽厚老师都曾以既独出机杼、又切中时弊的运思,以他文采飞扬、触类旁通的笔触,以他恃才傲物、高屋建瓴的风度,鼓舞、点染和示范过我们。所以,即使如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时所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可这种总是念念难忘的商榷和再商榷,不正表现出对于一位真正思想者的真正敬重么?

刘 东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于清华立斋

目 录

卷首语

论 文

- 姚大力 把过程置入历史书写——论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编撰
学的突破 001
- 韩 昇 杜佑及其名著《通典》新论 056
- 铃木贞美 “文学”与“艺术”概念在日本的形成 092
- 蒋英豪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文学”一词的变化——并论汉语
中“文学”现代词义的确立 130
- 刘宇光 左翼佛教：激进佛学、世俗公民社会与现代佛教的
政治反省 150
- 沈喆俊、曹炯镇 韩国所藏朝鲜朝前期稀贵本汉籍研究 184
- 陈时伟 中国近代研究院制度的衍生流变与中央研究院的
诞生 213
- 陈青生 上海“新潮社”及其文学活动 249

评 论

- 刘 东 中国研究领域的测不准原理 291

讲坛/通讯

- 王国斌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变革 302

书 评

雅克·布道(编):《建构世界共同体——全球化与共同善》 (梁晓杰)	312
比尔·雷丁斯:《废墟中的大学》(郭军)	319
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吕和应)	322
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赖国栋)	330
丁乃非:《淫欲的客体:〈金瓶梅〉的性政治》(古柏)	340
白根春雄:《日本近世文学选,1600-1900》(张键)	343
安妮·贝肯·金尼:《早期中国童年与青年的形象》 (高新华)	348
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高永旺)	353

Contents

Preface

Articles

Yao Dali ,Incorporating the Process into the Writing of History: On Sima Qian's Historiographical Breakthrough	001
Han Sheng, A New Discussion of Du You and His Masterpiece <i>Tong Dian</i>	056
Suzuki Sadami,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s Literature and Art in Japan	092
Jiang Yinghao,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Concept "Wenxue" at the Turn of 19 th and 20 th Centur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rn Meaning of the Chinese Term "Wenxue"	130
Liu Yuguang, Engaged Buddhism: Political Reflections on Radical Buddhology, Civil Society and Modern Buddhism	150
Shim Woo-Choon & Cho Hyung-Jin, Rare Chinese Books Printed in Korea's Early Dynastic Period and Presently Collected in Korea	184
Chen Shiwei,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a's Academia System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Academia Sinica	213
Chen Qingsheng, The Xinchao Society of Shanghai and Its Literary Activity	249

Reviews

- Liu Dong, *The Uncertainty Principle in the Field of China Studies* 291

Forum/Correspondence

- Wong R. Bin, *China's Economy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302

Book Reviews

- Jacques Baudot (ed.), *Building a World Community: Globalisation and the Common Good* (Liang Xiaojie) 312
- Bill Readings,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Guo Jun) 319
- Johann Gustav Droysen, *Historik* (Lu Heying) 322
- Paul Ricoeur,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Lai Guodong) 330
- Ding Naifei, *Obscene Things, Sexual Politics in Jin Ping Mei* (Paize Keulemans) 340
- Haruo Shirane, *Early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1600—1900* (Zhang Jian) 343
- Anne Behnke Kinney, *Representations of Childhood and Youth in Early China* (Gao Xinhua) 348
- Stephen C. Averill,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Gao Yongwang) 353

把过程置入历史书写

——论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编撰学的突破*

姚大力(复旦大学)

一

由《诗经》中的“大雅”及“颂”可知,至晚在西周中后叶,当相关诗篇被创作出来之时,上古中国人把发生在过去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置于连续的时空范围内,并将它们当作一个互有关联的变化过程来予以理解的意识,已经相当成熟了。若按〈生民〉(“大雅”第十一篇)、〈公刘〉(“大雅”第十六篇)、〈皇矣〉(“大雅”第七篇)、〈文王有声〉(“大雅”第十篇)和〈大明〉(“大雅”第二篇)的排列先后将这些诗篇通读一过,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组史诗,从而生动地展示出自姜嫄履大人迹而产弃,直至文王受方国、武王牧野伐纣的早期西周史。在实际的庙堂音乐歌舞表演中,它们或许很少有机会被全数采用。但这样一个追溯西周建国历史的叙事框架一定是周人所熟悉的。鲁僖公时代(前659-前627年)为修庙告成而创作的颂祷之辞〈閟宫〉是《诗经》里最长的一篇作品(《诗经·颂·鲁颂》,共八章)。它的前两章专述周人先祖故事,是即〈生民〉、〈皇矣〉和〈大明〉三篇内容的压缩,其中不过省略了〈公刘〉居豳以及〈文王有声〉所讲的作邑

* 本文系根据作者为一部有关中国史学观念史的集体著作所撰写的若干章节文稿修改而成。在修改过程中,曾得到朱维铮、虞万里、高智群等诸位教授的指教帮助,仅此致谢。文中不当之处,则应由作者个人负责。

于丰和武王迁镐的故事而已。〈商颂·长发〉则是展示商王朝先世事迹的一部歌舞剧的唱词。

追忆历史时空的过程意识之发育,也表现在《尚书》的编撰,即根据流传下来的片段材料去“复原”过去时代官方文书的持续数百年的努力之中。¹ 关于今本《尚书》各篇的写成年代,诸家考订多有不同。不过他们一般都同意,“《尚书》各篇所记的事越古,编成的年代越近。但后世所编定的各篇《尚书》本来不是伪书,只是不是当时所作,而出于后世的追述和编定罢了。”² 如果最大限度地综合各家见解,那么也许可以说,如今辑入〈周书〉的那些文献的主体以及部分〈商书〉,大体编定于西周时期;〈商书〉的剩余部分成于春秋;〈虞夏书〉则多写定于春秋末和战国之时。除去〈尧典〉等极少数篇章的例外,《尚书》诸篇大都采取记录性文书的形式,差不多不含有对长时期历史过程的直接叙述。但是,从《尚书》文本形成之经过,从它的編集者们为一系列重大历史关节“填补”记录空缺的良苦用心,我们多少能够看出,这部古典文献的众多作者,对那一段极其漫长的岁月还是抱持着某种通贯理解的。

1 此种“复原”工作的依据,部分来源于久远以前的书面文献,如金文,或世代传承下来的简册;另有部分依据的是古老的口耳相传的材料;当然也会有部分后人添加的想象、追叙或解释。在这一点上,先秦中国与早期希腊的历史编纂学传统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后者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取向。其一以希罗多德为代表,基本上只注重最近的事件,而小心翼翼地将遥远的过去一笔带过。其二以赫拉尼柯(Hellanicus)为代表,倾向于从有关远古的神话和传说中取材来构建历史,并把那些神话和传说置入与当前现实相关联的世系及编年中去。两种取向的共通之处,是它们都仅只取材于传说或者书面化的传说,而不去“爬梳”产生于与所述事件同时代的原始文献。参见塞特斯:《追寻历史:古代世界的历史编纂学与圣经史学的起源》(John van Seters, *In Search of History: Historiography in the Ancient World and the Origins of Biblic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第23页。不过中西方历史编纂学传统之间的差别,其实也不像乍看上去那么巨大。在中国,关于三代乃至更早时期的很大一部分以即时记录形式出现的文献,实际上也带有相当程度的“书面化传说”性质。而传说的书面化,同时又是一个将神话历史化的过程。这个“历史化”过程虽然褪去了故事主人翁身上浓厚的神话色彩,却又以另一种形式把他们放大了。尧、舜、禹等人作为当初比较有影响的酋邦首领(如果他们真的存在过),就这样被放大为类似后世那样的“天子”。

2 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9页。

中国思想史上针对以往各历史时代更迭变化之宏观走向的思考(为提说方便起见姑且称之为“历史哲学”),最早似见于周人以“罔德”、“用德”来解释天命转移的观念。³ 由春秋至于战国,诸子在阐述制度变换、文化起源、兴亡治乱的转变法则等方面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具有历史哲学性质的系统见解。根据倪德卫的分析,我们甚至可以从中窥见“道德的历史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分析批判哲学”的倾向,以及“关于社会与道德的契约论审度”。⁴ 不过另一方面,这样的论说又全然不具备历史叙事所应有的详实性。它们有时好像是基本不涉及具体历史事实和情节的纯逻辑推导;有时虽然也包含了若干在论说者看来是具有知识方面真实性的历史证据,但它们经常是跳跃性的,在时代上相隔遥远。与那时业已积累起来的数量巨大的历史知识相比,这些议论未免又显得有些单薄或粗疏。

以上三项事实也许足以表明,在试图观照并重现以往的历史时,人们几乎天然地就能感受到它所具有的过程特征。奇怪的是,尽管先秦时代的历史书写已经足够成熟并达到了非常高的成就,尽管这时候的“历史哲学”对历史所呈现的过程性已经产生了丰富的感知和颇为深刻的意识,这两者却一直未曾真正获得结合。在由刘知几所界定的史体“六家”中,有四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和“国语家”)出于先秦。我们今日在观照历史时所带有的习以为常的过程意识,事实上却全然没有进入四家的历史书写。从这样的事实出发,我们便更容易看清,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编撰学最

3 在指出今存相关思想史的最早资料始于周初的同时,倪德卫(David S. Nivison)认为,中国人试图回答是谁把“天下”的统治权授予某个王朝、此种统治权何时及因何又会被授予者所剥夺等问题的“最初答案”,实可由天象学求之。发生在前1953年、前1576年和前1059年的诸星会聚或“准会聚”,分别被当作上天昭示夏、商、周三代兴替的征象。问题在于,事实上并没有证据显示,先秦的人们自身已经把夏商两代的崛起与上述天象互相联系在一起了。孟子关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观念,是否以当日的天象学知识作为背景,倒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不过它无论如何要晚于西周用“德”来解释天命授受予夺的历史哲学式思考。参见倪氏为《中国哲学百科全书》撰写的“历史哲学”专条(*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 Edited by Antonio S. Cua,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2003),第540-554页。

4 参倪德卫为《中国哲学百科全书》撰写的“历史哲学”专条。

重大的突破,就在于唯有在他的笔管下,历史叙事的过程性格才被悉心置地置入中国历史书写的传统之中。

因此,本文的以下各部分拟先揭示出,在考察过去时专注于“断其义”、“骋其辞”的趋向,如何阻碍了先秦史学著述对于历史过程性的探究及其呈现。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而就可以较详实地讨论如下的问题,即《史记》是怎样开创一种得以充分展示历史变迁过程性的史学书写新范式的。

二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当人们记忆过去和试图保存这种记忆的时候,他们所从事的就是历史学的活动。这样的历史学至少从商代就已经开始了。虽然甲骨卜辞,包括验证占卜结果的“验辞”在内,或许都属于对帝或诸神的交待,所以不能算是有意识的历史记录,但出于祭祀先王需要或其他动机而保存、流传下来的商王世系,至少可以看作具有历史记录的性格。西周的金文,更是绝大多数都被当作自觉的历史记录而刻铸的。⁵

追忆往事的动机是各式各样的。希罗多德写作《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亚洲[在波斯人手中]的统一,该帝国把疆域扩大到大陆之外的企图,以及此种企图之如何失败”;同时,希罗多德还想从自己的描述中阐明这段历史之所以如此发生的两个重大原因,即人类“不公正的行为”,以及人对自身成就的骄傲与神为此的恼怒之间的因果报应。⁶

撇开西周金文所反映的历史书写的种种意图不谈,自春秋开始直到孔子以前,在人们记录历史的诸多目的中间,有两样动机已经变得特别明显。其中一个是把过去看作处理当前重大问题的经验或教训。据《尚书·康诰》,成王(实际是周公)教训往监商人故地的康王,要他“绍文衣德,往敷求

5 周代金文记录铸器者受周王册命之经过的最典型例证之一,是由一个名叫“颂”的贵族刻铸的一组铜器,包括数量不等的壶、鼎、簋,上面都有纪念性的铭文。它们表明,周王所颁册命,其原始文本是书写在简上的。这些礼器当然是为祭告祖先而制作,但它们同时也含有“用对王休,子子孙孙,其永宝”,或曰“永宝用”的纪念性意图。

6 塞特事前揭书,第33-34页。

于殷先哲王，用保人民”，亦即除了继承文王衣钵外，还应广求殷商先代的贤王之道，以安定其旧有百姓。《尚书·酒诰》则把殷的灭亡视为警戒：“今唯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乎时？”无论是从正面或是反面，殷的历史对周代政治都是重要的借鉴。在《尚书·召诰》中，寻求历史经验的对象更上溯到“有夏”：“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无逸》也以商史为鉴，谆谆然提醒当道者“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并以“呜呼王其监于兹”的恳请口吻结束全文。上面列举的例证也许很可以表明，在古代中国，历史意识发生、发育的驱动力，不在于对纯粹知识的好奇与追求，而是直接与对现实局面的关注，或者用后来的话说即所谓“经世”，相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另一个目的，则是要对个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无论正面或者反面，作出裁判并且传之后世。春秋时代晋国的赵穿谋杀了他的国君灵公。太史董狐却记载曰：“赵盾弑其君。”董狐的理由是，赵盾身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所以他应是这次弑君事件的主要责任承担者（《左传·宣公二年》）。这里显然蕴涵着后世所谓的“书法”。时人对历史审判的畏忌，生动地表现在宁殖因驱逐卫君的行迹被记入史策而发生的深刻焦虑：

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许诺，惠子遂卒。（《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徐复观写道：“宁殖（惠子）逐了卫君，使他死后的鬼，宁馁不食的，不是在鬼神世界中所受的审判，而是‘名在诸侯之策’的这种史的审判。所以他嘱咐他的儿子（悼子）的，不是为他向鬼神祈祷，而是要迎入卫君以掩盖他‘出其君’的行为。”徐氏又引述了齐国的崔杼为太史写下了“崔杼弑其君”五个字而杀死三个史官，并使另外两人“走向生死的边缘”的著名事例。他说，这是因为崔杼意识到，“这五个字是对他作了绝望的审判”。⁷

7 徐复观：《论史记》，《两汉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卷，第144页。

上述两种动机被结合、归并在一起,初步形成一种观照历史的特定道德角度,恐怕是在孔子之前。而孔子删定的《春秋》,则把历史学所承担的道德批评的功能极度地扩大了。所谓孔子笔削而使“乱臣贼子惧”,正是这个意思。甚至《春秋》中若干处“有年”的简略记载,也被有些学者看作不仅仅是关于年成的报道,而以为它也许隐含了孔子对当时政治的批评:世局昏暗却遇到丰年,这与寻常的丰收大异其趣,所以他要特地志其怪异。在儒家最先将古代文献经典化的过程中,道德批判也就越来越突现为历史书写的最重要功能之一。

《春秋》一类具有官纂性质的各国大事记,它的原型,或许保留在“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的《秦记》中。⁸ 睡虎地秦简“大事记”就是这样的体裁。它记事殊少写明月份,记日的例证则一个也没有;但同时它每年必书,即使连续三四年不书具体事件,仍要将纪年载录在册。是证它以年为记事的时间单元。而以“春秋”名史的意思则是:“春秋编年,四时具而后为年”;因而“立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⁹ 这样说自然不错。不过更准确地讲,今本《春秋》其实不是以年,而是以四时亦即季度作为记事的基本时间单元。试看下列典型例证:“(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春,晋杀其大夫平郑文。夏,公及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阳谷。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黄。”这一年四时各记一事,但唯秋季记事书月。正因为以“时”作为基本的时段划分,所以才会出现今天看来有点奇怪的“竟时无事,乃书首月以纪时”的体例。全书中有一个年份的记录三时无事:“(定公)七年(公元前503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齐侯、郑伯盟于卤。齐人执卫行人北宫结,以侵卫。齐侯、卫侯盟于沙。大雩。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¹⁰ 孔子之前,鲁国国史即名“春秋”。但以四时为记事之基本时间

8 引文见《史记·六国年表序》。本文以下部分凡引述《史记》,将尽可能改用括注形式。

9 引文见《春秋谷梁传》,“桓公五年,冬十月”条;《史通·六家》。

10 《春秋》经中偶见缺书“首月以纪其时”的情形,古人也有强为之解者(如《公羊传》“桓公四年”何休注)。最合理的解释,似乎还是文本夺字或脱简所致。

单位的编史体裁在当时是否已经成立,颇有可疑之处。它当时更可能仍以编年为体。¹¹章太炎推测,西周共和前尚无纪年之牒。“始作《春秋》者,宣王之史官”,尔后又有晋、郑等国“依中兴之法以纪年”。¹²以“春秋”作国史名称的,除鲁国外似还有周、齐、燕、宋等诸国。¹³其他列国当然也都有大致按年代顺序编定的大事记,此即章氏“依中兴之法以纪年”之谓。

经孔子改编的《春秋》,与它原先的文本,或者与形式类似的其他年代记相比,有两项相近之处。其一,它们的记载都极简略,叙事直指最终结果,极少细节或过程描写,或者其他必要的补充说明。刘知几提到汲冢竹书说,其记事之烦省,“与《春秋》不别”。再从前面引述的“赵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从睡虎地秦简“年代记”里的“四年攻封陵”、“八年新城归”,乃至“不修春秋”所云“雨星不及地尺而复”等语¹⁴,应可断定记事简略的确是当时各国编年史的普遍风格。

由是又引起另一项相似之处,亦即,这样的文本体例足以把当时人认为重大的事件记录在册,也很适宜用断制式的言辞表达记录者对此的判断、评价甚至情感上的好恶。但它一般不鼓励对事件全过程的具体观照,而被记

11 洪业枚举数证,断定冠于月上的四时为“增窜之迹,甚可疑也”。他的结论值得重视。他又根据《春秋》日蚀记录逆推该年正月朔日之所在,由以证实立春之日有不在正月之内者,故谓今本《春秋》必以正月为春之始,显非当时实录,而出于后来的追加。惟周历以含冬至之月为正月(建子),比夏历岁首的寅月提前两个月。而以正月为春之始,原来是与夏历相适应的季节配列;以之套用到周历系统,必与实际节候不符,本来就谈不上实录不实录。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把夏历的四时配列套用到周历的月份上去,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有人以为它出于孔子之手。如是,则鲁国《春秋》中虽无记录四时之制,但它们在孔子的编年本中就已存在了,因而也不属于更后来的“增窜”。参见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台北重印本,1966年;平势隆郎:《左传之史料的研究批判》,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第18-20页。

12 章太炎:《春秋古氏疑义答问卷》,《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册,第248页。按章氏断《春秋》始于宣王史官,或与《墨子·明鬼》谓宣王中箭之事着在“周之春秋”有关。

13 见《墨子·明鬼》。

14 《春秋公羊传》“庄公七年”引。按“不修春秋”指未经孔子删削过的鲁《春秋》。是句在今本《春秋》里被改写为“星陨如雨”。

录的诸多事件之间在更大的时空框架中所可能具有的内在关联或曰过程性,则更容易在不经意间就被它过滤掉了。历史书写体裁,不仅被动地反映出书写它的人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而且还会反过来强化人们的这种思维取向。在两者的反复互动中,先秦的人们对历史之过程性的意识有逐渐被抑制的趋势,或许在孔子之前已然发生了。但是孔子的道德批判史观,则肯定是决定性地增强了这一趋势的扩张。¹⁵

仅凭留传至今的一两条“不修春秋”的遗文,我们现在已无法具体、直接地感知孔子的删定本与鲁《春秋》原有文本之间的差异究竟如何。但先秦、秦汉时人都相信,孔子对文本的改动,主要是删节了部分文字以及所谓“属词比事”,即通过个别字句的修饰调整来微言大义,表达自己对所述史事的立场和看法。通过刻意删削与“属词比事”,并辅之以对弟子的口传旨义,孔子赋予《春秋》以某种贯通始终的新解释和新精神。这就是用礼和仁的轨度去论定春秋一代重大史事,或曰“黜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也就是以“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的“书法”或“义法”,达到“惩恶而劝善”的目的。¹⁶钱穆因此给予《春秋》以高度赞扬,说它已“崭然成为一部新史”。¹⁷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仅用“记录性”来概括包括《春秋》在内的先秦历史著作的特征,似乎就有一点不够准确了。¹⁸我们毋宁说,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的历史观,其关注的重点并不在历史事实的“记录性”,而是对各项历史事实及有关历史人物在道德、政治和文化上善恶是非的评判。正如顾颉刚所写的,孔子“提起古人,不是传授历史知识,乃是教人去效法或警戒”。徐复观也明确地指出,“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的所

15 洪业在前揭文里,细考古人有关《春秋》的各种言说,力辩今本《春秋》即鲁国史,未可证孔子笔削之说。若是,则无须孔子推波助澜,道德批判的史观在鲁《春秋》中已蔚然如偃草之风矣。在这一点上,本书仍以目前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看法为讨论前提。洪氏又谓《左传》成书于汉惠帝以后。近代以来有不少学者主张左氏传作于汉代。按:《左传》中的少数文字可能为汉代所追改;但说它的基本形态形成于战国中期,或许更接近事实。

16 见《左传》“成公十四年”。

17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7-18页。

18 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台北:学生书局,1990年,第2页。

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的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凡德伦(Piet Van der Loon)则认为，中国历史编撰学从前孔子时代向孔子时代的演进，乃是从“礼仪性”史学走向对历史的“道德化”利用。¹⁹

这种“史的审判”经常会导致被考察的事件或人物从它们的时空背景中被剥离出来，成为一堆互相孤立的、只是在价值评判的意义上才可以进行比较的“个案”。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儒家在作“史的审判”时，丝毫不理会特定事件或人物所处的具体时代及其历史环境。《春秋》“桓公三年”谓：“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胥命即互相致约会面。公羊传说，这是孔子赞许齐国君“近正”。“此其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结言而退”。谷梁传也有相似的解释：“以是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齐侯命卫侯也。”四十多年后，形势变化了。春秋初霸齐桓公盟诸侯于幽地，《春秋》记之。此事虽然违反“古者不盟”的旧制，但孔子似仍有赞许之意。谷梁传说：“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会十有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²⁰可见儒家并不僵硬地拘守“五霸三王之罪人也”这样一条死教条而闭眼不问历史实情。然而，这种“假事张义”的评判眼光²¹，对于其一系列审视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严重缺乏观照，则仍然是明显的事实。这种被后世称作“据经发义”的历史学取向，经过孔门的代相传授，在先秦时代的历史思考领域内成为最有影响的风气之一。在此种思维定势影响下，当时人们为什么会对于历史沿时间维度所展现的过程性长期缺少探求意识，似乎也就不是特别难以理解了。

三

与《春秋》关系最为密切的先秦历史著作，固非《左传》莫属。刘知几拘

19 顾颉刚前揭文，《古史辨》第7册，上编，第8页；徐复观前揭书，第3卷，第156页；凡德伦：《古代中国的编年纪与历史观念的发育》，载W. G. 毕思莱和E. G. 普立本主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

20 见《春秋谷梁传》“庄公二十七年”。

21 语见《春秋繁露·玉杯》。